

智媒时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生成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

姜燕¹, 钟大年²

(1.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摘要: 智媒时代的老龄群体普遍面临基础操作薄弱、信息甄别乏力、深度参与缺失等数字融入困境。立足媒介素养理论,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媒介素养在数字社会中的衍生形态,构建涵盖基础操作、认知批判、实践赋能的三维分析体系。引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揭示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是技术供给结构性排斥、网络信息环境失衡、社会支持体系缺位及个体心理防御机制激活等多层因素叠加所致,且四者依次传导、循环强化,形成自我强化闭环。据此,提出了政府、平台、社会、家庭与个体多方协同的系统性提升机制:技术供给层面,主张摒弃功利化改造,推动全流程适老化原生设计,实现从“后期适配”向“源头设计”转型;信息环境层面,倡导推进算法向善治理,破除信息茧房,规制平台隐性价值抽取,扩大老龄群体在数字公共空间的话语权;社会支持层面,强调完善制度兜底,激活家庭代际数字反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个体心理层面,注重提供心理疏导与赋能,重塑老年人的数字自我认同,激发其主体能动性。通过多维治理旨在破除代际传播障碍,助力老龄群体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数字转型,为建设积极老龄化与包容型数字社会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智媒时代; 老龄群体; 数字素养; 媒介素养; 数字鸿沟; 生成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与研究缺口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社会变革之中,公共服务、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的底层逻辑被系统性重构,数字化已从一种工具性选择演变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性环境^[1]。尤其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大语言模型、算法推荐、智能交互终端等正快速渗透教育、医疗、金融、政务等社会现实场景,智媒时代的来

临,既为老龄群体数字融入提供了新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代际数字适应差距。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浪潮持续加深,截至 2025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①。这两大趋势的历史性交汇,催生出了一个紧迫且复杂的社会命题:规模庞大的老龄群体,如何在日益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提升数字素养,进而有尊严、有质量、有深度地融入数字社会。

我国老年网民规模虽已增至 1.61 亿人^②,

引用本文: 姜燕, 钟大年. 智媒时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生成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28(2): 94-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27)

作者简介: 姜燕(1982—),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研究。E-mail:554791045@qq.com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② 数据来源:新华社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1.6 亿“银发网民”加速“链接”数字世界》。

数字接入率显著提升,但数字接入的普及并未带来平等的数字包容,数字鸿沟呈现从“接入鸿沟”向“能力鸿沟”“使用鸿沟”深化的趋势,老龄群体因数字素养生成困境导致数字素养不足,进而引发的数字社会融入障碍愈发严峻。老龄群体的数字实践中,不少老年人因缺乏数字技能成为“数字失联者”,无法便捷获取在线医疗挂号、政务办理等基础服务;已入网的老年人多停留在微信聊天、短视频观看等浅层数字实践,在信息甄别、网络安全防范、数字内容创作、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能力薄弱,面对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AI驱动的精准电信诈骗时防御能力不足,易成为此类风险的主要受害群体,财产安全与身心健康遭受威胁;平台设计对老龄群体的忽视、算法逻辑加重了老龄群体认知的窄化,老龄群体的“数字失语”现象普遍,主体性进一步消解,使其难以在数字公共领域表达自身需求、分享生活智慧,陷入数字素养不足引发的网络空间边缘化困境。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老龄群体的生活质量与权益保障,也与国家“积极老龄化”“包容性数字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相悖,亟须进行系统性研究予以破解。

既有研究围绕老龄群体数字素养议题展开了多维度探索。在数字鸿沟表征层面,陆杰华等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构建了结构性分析框架,揭示了老年数字鸿沟作为社会不平等在数字空间延伸的本质特征^[2]。在技术采纳机制方面,武文颖等通过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提出“反思型技术转化框架”,揭示了老年人通过认知重构、情绪调适、意义激活三重机制实现技术内化的动态过程^[3];罗强强等则聚焦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构建了技术操作、信息甄别、风险防范、创新应用四维能力模型^[4]。在治理路径探索上,董焕晴等基于活动理论框架提炼出政府主导与多方协同、智能技术工具多样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数字技能培训提升、规则流程标准化五大实践逻辑^[5];刘述从积极老龄化视角总结了香港地区优化数字接入环境、技能素养培训、激励措施支持、适老产品开发的四维路径^[6];胡泳等则提出从适老化到数字适老化的范式转型,倡导以数字消极自由为根基的双向适应原则^[7]。这些研究

为理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初步勾勒出从问题识别到路径探索的研究图谱。然而,综合审视现有成果,仍可发现研究视角的整合不足:一是多数研究或聚焦微观技术采纳的心理机制,或关注宏观制度设计的协同路径,却较少将个体认知转化、技术设计逻辑与社会结构约束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二是既有研究多将数字技术视为中性工具,对技术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价值预设及其对老年人主体性的形塑作用关注不足。三是在解决方案层面,现有研究虽提出了多元协同治理路径,但多存在割裂技能提升与权利保障、技术适应与人文关怀的内在关联的问题,尚未形成贯通微观-中观-宏观的系统性治理框架。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不足所导致的数字融入困境正演变为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治理效能、代际关系和谐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代命题。为此,本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的传播生态中,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具体表现为哪些相互关联的层面?这些困境是如何在技术设计、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的复杂互动中被持续生产与固化的?进而应如何构建一个超越碎片化应对的系统性治理体系,以有效支持老龄群体完成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数字社会转型?通过此次研究,笔者不仅关注老龄群体技术能力的提升,更重视其在数字环境中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表达与主体性建构,旨在有效贯通个体心理机制、技术设计逻辑与社会结构约束,从而系统揭示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为构建兼顾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数字包容生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二、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理论框架:媒介素养的数字时代衍生与多维拓展

从词源学看,“素养”远不止于基础的“能力”或“技能”,能力指向“会不会用”的操作层面,而“素养”则是一个更为综合、更高阶的概念,涉及个体在与媒介信息环境持续互动中所形成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与行动习惯。在智媒时代,这一区分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工具理性关注“如何高效使用设备”,解

决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价值理性则聚焦“如何批判性审视技术、保护权益及参与治理”,关乎数字主体性的确立与维护。当前,老龄群体数字素养培育的紧迫任务,正是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范式转向。在深入剖析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表征之前,本研究首先明确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其立论基础在于数字素养尽管不是传播学的传统概念,但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媒介素养在数字时代的自然衍生与进阶形态。

数字素养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普及对个体能力的新需求,是媒介素养的衍生形态。传统的媒介素养概念立足于个体对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信息的认知、解码与批判能力,而伴随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智媒技术的深度嵌入,媒介生态发生结构性转型,媒介素养的内涵边界随之拓展,逐步演化为以数字媒介为轴心、整合多维能力要素的数字素养体系。在此框架下,算法素养与人工智能素养被纳入其中,与既有能力维度协同共生,构成智媒时代主体能力结构的关键向度,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当下,老龄群体的核心素养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技术接入与操作使用,而是演变成为一种对数字主体性的坚守,体现为在技术洪流中保持独立判断、维护自身权益、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与意识。本研究着眼于老龄群体数字实践,因而将“数字素养”界定为:老龄群体在数字传播环境

中,为达成有效沟通、满足生活需求、参与社会事务并保障自身权益所必须具备的综合性能力体系,既涵盖传统媒介素养的批判内核,又整合了智媒时代应该具备的高阶能力。

具备数字素养的老龄群体不仅能够操作数字设备,更能够理解数字信息背后的生产逻辑,批判性地评估其真伪与意图,自主决定何时及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并将数字工具有效转化为服务自身生活目标和社会参与的桥梁。数字素养体系包含3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从“功能操作”到“识别判断”,再到“有效转化”,层层递进,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为使这一概念框架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本研究将三维素养体系进一步细化为具体测量指标体系(表1)。

第一,操作维度的功能性能力。这是数字素养的前提,指老龄群体掌握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够跨越技术接入的门槛,实现基础的“会用”。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这一维度还包括对基础AI工具的操作能力,同时具备理解算法推荐基本逻辑的初步能力,破解“不会用”的操作困境。该困境源于技术供给与老龄群体实际需求之间的错配,设备界面复杂、功能迭代频繁、适老化改造不足等均会制约老龄群体的技术接入。

第二,认知维度的主动性意识与批判能力。这是数字素养的核心,既指老龄群体拥有主动使用数字技术、算法工具及人工智能应用的意愿和信心,体现为对数字工具价值的积极认知、

表 1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三维体系测量指标

维度	测量指标	具体行为示例
操作维度 (功能性能力)	智能设备基础操作熟练度	安装/卸载应用、账号注册登录、支付功能使用、字体/音量调节
	AI 工具使用频率与类型	语音助手唤醒、智能问诊咨询、AI 翻译使用、生成式 AI 基础操作
	适老化功能知晓率与使用率	长辈模式开启、大字体设置、语音输入使用、一键呼叫功能
	独立完成线上事务能力	医院挂号、水电缴费、网购下单、出行叫车
认知维度 (主动性意识与批判能力)	算法推荐意识	知晓个性化推送机制、理解“猜你喜欢”的逻辑、识别广告与内容边界
	信息真伪甄别能力	识别虚假谣言、辨别诈骗链接、核实信息来源、交叉验证信息
	AI 生成内容辨识能力	区分 AI 生成文本/图片、识别深度伪造内容、判断内容可信度
	数字风险感知水平	隐私泄露风险意识、账号安全保护、陌生链接警惕性
实践维度 (有效性转化能力)	新技术学习意愿与自我效能感	主动尝试新功能、面对操作困难时的坚持程度、学习信心评估
	数字工具生活化应用程度	利用数字技术解决日常问题的频率、依赖程度、替代传统方式比例
	社会参与广度	线上社群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家庭群互动、志愿服务报名
	数字内容创作行为	发布原创内容、分享生活经验、制作短视频、评论互动
	数字权益维护能力	隐私设置调整、投诉维权操作、举报不良信息、退款申请
	技术使用满意度与获得感	使用后的便利感、生活改善感知、继续使用的意愿

对新技术学习的开放态度,具体表现为算法素养与人工智能素养。Ridley 等将算法素养定义为一种集意识、技能与知识于一体的综合能力,包括理解算法机制与应用场景、运用算法工具解决实际问题、评估算法的影响以及用参与者身份介入算法决策过程^[8];彭兰进一步将大众算法素养培育的核心聚焦于接受算法思维的挑战、提升算法风险的识别与抵御能力,最终实现“与算法共存”的主体性状态^[9],这正是老龄群体数字认知能力的关键体现。而 Ng 等提出的多维度 AI 素养框架,涵盖了知晓与理解、使用与应用、评估与创造等核心维度^[10],为老龄群体认知 AI 技术、辨别 AI 生成信息提供了理论参照,有效弥补了传统媒介素养在智媒时代的适配缺口。然而,算法的隐蔽性与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使老龄群体在信息甄别与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易陷入认知困境,尤其在智媒环境下,老龄群体面临一系列新型风险,包括“深度造假”的辨识困境、算法操控下的诱导性消费与信息茧房固化及隐性伦理陷阱与认知博弈等多重挑战。这些风险不同于传统的操作障碍,而是涉及深层的认知博弈与伦理陷阱,亟须价值理性层面的批判能力予以应对。

第三,实践维度的有效性转化能力。这是数字素养区别于一般能力的本质特征,要求老龄群体能将数字技术、算法工具及人工智能应用真正“为我所用”,实现从“会用”“愿用”到“用好”的升级。具体而言,这要求老龄群体既能通过数字工具有效获取有用信息、便捷办理日常事务、拓展社会连接等,也能依托算法素养、人工智能素养,理性规避算法窄化、虚假信息等风险,抵御网络诈骗,避免技术沉迷或滥用。批判性数据化素养理论指出,个体需要具备“理解数据化机制、反思数据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将自身定位为算法决策的共同构成者”的能力^[11],这一视角与 Fuchs 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理论互补^[12],揭示了老龄群体在实践层面遭遇的结构性障碍,而突破这一障碍,正是数字素养实践维度的核心目标。此外,Bucher 关于“算法想象”的论述指出,算法的“不可见性”加剧了老龄群体的技术焦虑,使其形成“因未知而畏惧、因畏惧而回避”的恶性

循环^[13]。实践层面的转化困境既与老龄群体的个体心理机制有关,也折射出技术设计、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不足。

综上,本研究所讨论的“数字素养”以传统媒介素养的批判内核为基础,整合算法素养、人工智能素养等,形成从操作到认知再到实践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工具理性解决“会不会”的技术门槛,价值理性回应“该不该”“凭什么”的伦理追问。因此,数字素养并非对老龄群体“会不会”的简单判断,而是对其在数字社会中能否实现“会用、愿用、用好”的综合考量。在各类技术快速迭代的智媒环境下,老龄群体需要在技术洪流中保持数字主体性,既要善用技术之便,又要警惕技术之险;既要享受数字红利,又要维护自身权益。这一界定为后续分析老龄群体在接入、使用、参与各层面遭遇的困境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标准,也为理解智媒环境下新型风险的独特性奠定了概念基础。

三、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生成困境： 传播障碍与传播隔阂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体或群体的能力短板,该问题是一个由表及里、逐层深化的系统性谱系,其具体表征与基础操作、认知批判、实践赋能的三维素养体系形成对应。从数字传播实践来看,这一困境本质上体现为传播障碍与传播隔阂的交织作用:传播障碍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阻碍因素,传播隔阂则表现为老龄群体对网络内容的不熟悉、易轻信或难以接受。两者贯穿数字接入、日常使用与深度参与的全流程,共同构成老龄群体数字融入的多重阻力。基于此,从初始传播接入—日常数字使用—深度社会参与 3 个递进层面,系统拆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具体表征,既涵盖基础操作能力的缺失,也凸显算法素养、人工智能素养等高阶能力的薄弱,揭示不同层面困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后续剖析其多重诱因提供具象化的理论支撑。3 个困境层面与前文提及的数字素养三维体系形成明确对应:操作维度对应初始接入层面,解决“会不会”的技术门槛;认知维度对应日常数字使

用层面,回应“愿不愿”的心理与认知挑战;实践维度对应深度社会参与层面,指向“好不好”的主体性实现。这一对应设计基于数字素养生成的内在规律,即素养培育遵循从技术接入到日常使用再到深度参与的递进路径。通过这一框架,本研究将抽象的素养维度转化为具象的实践困境,既保证了理论分析的一致性,也为后续探究困境诱因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线索。

1. 初始接入层面的多重屏障

数字素养培育的起点是有效且有意义的技术接入,然而老龄群体在第一道关口便面临物质、心理与制度的复合传播障碍。这些阻碍信息有效传递的客观因素不仅直接拦截了数字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更易催生传播隔阂。

第一,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获取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尽管网络覆盖日益广泛,但在城乡、区域与收入差异的结构性影响下,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龄与低收入老龄群体,在获取性价比合适的智能终端和稳定网络服务方面仍面临实际困难^[14]。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作为典型的物理层面传播障碍,阻断了数字信息触达,使得老龄群体长期“未接入”数字社会,进而导致对网络内容的接触机会匮乏,难以实现有效信息交互。

第二,更为普遍的是心理抗拒与智能设备操作技能缺失的双重困境。许多老年人虽拥有智能手机,却因对触控交互逻辑陌生、对应用安装与账号管理等操作产生畏惧心理,设备使用效能因此而大幅降低。更深层的是,网络舆论场中充斥的电信诈骗、隐私泄露等“风险叙事”,经过媒体报道不断放大和渲染,极易在信息接收渠道相对单一的老龄群体中产生广泛的数字焦虑与不信任感^[15]。这既强化了传播障碍,更直接加剧了传播隔阂,使该群体对网络内容产生抵触心理或易轻信负面信息,进而采取防御性策略,主动选择“数字隔离”,从而形成了“拥有设备”与“实质使用”之间的巨大落差。

第三,“数字优先”执行偏差造成了可及性障碍。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整体效率的同时,若缺乏充分的包容性设计和替代性保障,便会无形中构筑起数字社会的准入壁垒,在多种社会场景中形成针对老龄群体的传

播障碍。如医院过度削减线下挂号窗口、政务大厅片面追求“一网通办”等做法,实际上将不熟悉数字操作的老龄群体排除在基本公共服务信息体系之外,不仅剥夺了老龄群体数字接入的权利^[16],更降低了公共服务沟通效率,甚至会引发老龄群体的不满与矛盾。

2. 日常使用层面的技能困境与认知风险

对于跨越初始接入障碍的老龄群体而言,数字融入过程仍面临多重挑战,平台规则复杂、信息风险隐蔽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老龄群体对网络内容不熟悉、易轻信的传播隔阂,凸显其在使用层面的困境。

一方面,生理认知与界面设计之间的错配。老龄群体视听觉灵敏度下降、信息处理速度减缓等生理变化,与主流应用追求信息密度、视觉冲击、快速交互的设计逻辑存在根本矛盾。小巧的字体、抽象的图标、隐蔽的多级菜单以及频繁的版本更新所带来的操作逻辑变动,持续产生高认知负荷,成为阻碍其使用数字工具的传播障碍。

另一方面,算法逻辑塑造下的“认知窄化”与“风险暴露”。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以最大化用户黏性与停留时长为目标,极易识别并持续强化老龄群体对健康养生、家庭伦理、怀旧内容等特定内容的偏好,使其陷入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茧房”^[17]。尤为严峻的是,定向且封闭的信息推送为精准诈骗提供了滋生土壤,保健品推销、金融诈骗等常借算法推送或社交群组渗透,而老龄群体信息甄别能力较弱,易成为网络欺诈的主要目标,受害经历又强化其对网络内容的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18]。

3. 深度参与层面的主体性危机

技术使用并非数字融入的终点,很多老年人虽已接入并使用数字技术,但在深度参与层面仍面临主体性挑战,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表达参与渠道的阻塞及数字劳动中的价值剥夺共同指向其数字主体性危机。

第一,批判性信息处理能力的普遍薄弱。在情绪化、碎片化信息泛滥的“后真相”环境中,判断信息真伪、追溯信源、识别逻辑谬误变得至关重要。然而,许多老龄群体仍高度依赖传统媒体时代的权威信源模式,对于自媒体、营

销号生产的海量内容缺乏系统的质疑框架和验证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或社会热点中,老龄群体不但易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也可能在不自觉中成为传播节点^[19],加剧传播中的认知偏差与群体误解。

第二,社会参与和创造性表达渠道的阻塞。数字技术本应赋能个体进行公共表达、参与社区事务、发展兴趣并进行文化创造,但大多数老年人的线上活动集中于被动消费信息与维系初级社交。技术平台的交互设计、社区文化和话语体系以年轻用户为中心,无形中设置了高参与门槛,构成了老龄群体表达与参与的传播障碍,使得老龄群体因对网络表达规则和内容生态不熟悉,难以在数字公共领域找到有效的表达方式,处于“数字失语”的状态。

第三,无酬的“数字劳动”与价值的系统性剥夺。“受众即商品”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论断,其揭示了用户的注意力、时间以及行为数据也是平台资本积累的重要资源^[12]。老龄群体投入大量时间为平台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活跃度、用户黏性与数据流量,却难以察觉自身价值被剥夺,更无法通过创造性表达改变处境,在不自知中巩固了自身在数字价值链末端的位置,其商业逻辑在于将老龄群体休闲时间转化为低酬的平台劳动,这种不平等的价值分配凸显了老龄群体在数字传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也揭示了数字素养内在逻辑中的核心矛盾:掌握技能越多、使用越频繁、参与越活跃的用户,恰恰是主体性被消解、价值被剥夺越严重的群体。

四、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动态机制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表征明确了传播障碍与传播隔阂对数字融入的阻滞作用。数字素养的培育并非个体孤立的行为,其提升过程始终受外部技术供给、信息生态、社会支撑与内部心理状态的综合影响,即老龄群体深陷数字融入困境,并非单纯的个体能力短板所致,而是技术供给的设计导向、失衡的信息环境、缺位的社会支持与被动的个体心理相互交织、叠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直接放大了数字素

养的薄弱环节,又进一步固化了传播障碍与传播隔阂。引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基于结构二重性命题——社会结构既由行动建构,又是行动得以可能的中介^[20],在老龄数字素养情境中智媒技术设计与平台规则构成数字场域的结构特征,老年人数字实践既受结构约束,又通过日常使用再生产这一结构^[21]。基于此,从技术供给、信息环境、社会支持、个体心理 4 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四者依次传导、循环强化的自我强化闭环机制(图 1),为理解老龄群体数字边缘化的持续再生产提供动态解释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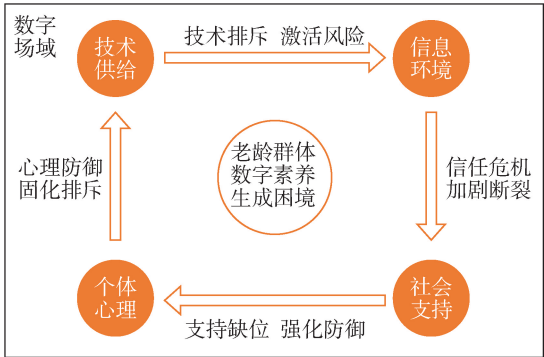


图 1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的动态机制

1. 技术供给维度:智媒适老化设计的结构性排斥

技术供给端的设计偏向是老龄群体数字接入与使用障碍形成的首要诱因,也从根源上制约了其数字素养的培育,进一步加剧了数字融入的传播障碍。当前,智能媒介产品的开发与迭代带有一定的年龄偏见,主流互联网产品的设计逻辑均以年轻用户为默认模板,核心围绕商业价值最大化铺陈开来,其视觉呈现追求信息密度与视觉冲击、交互逻辑强调敏捷跳转与多级嵌套,与老龄群体视听觉衰退、信息处理速度减缓、需要清晰简洁操作的需求形成根本性矛盾。媒介是社会公器,兼具公共性、普惠性与服务性的内核,这种年龄偏见折射出了智能媒介开发者对媒介本质的认知偏差及背后潜藏的媒介伦理缺位。

当前,很多 APP 或小程序推出的所谓适老化改造、长辈模式,并未突破这种设计逻辑的桎梏,多停留在放大字体、删减功能等表面简化层面,并非基于老龄群体生理、认知特征的原生设

计,更多是将老龄群体视为需要被照顾的他者,而非平等的用户主体^[22]。即便老龄群体成功接入数字设备,也难以顺畅地完成复杂操作、有效获取信息,数字素养的提升失去了实践载体,基础信息甄别能力也因操作受阻无法得到锻炼。技术供给的结构性排斥,让老龄群体从数字接触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用不了、用不好的困境,既固化了接入层面的传播障碍,也为后续传播隔阂的加深埋下了伏笔。

技术设计中的规则与资源共同构成数字场域的结构特征,但这些规则和资源往往以年轻人的实践意识为基础进行设计,未能考虑老年人实践意识的特殊性^[21]。配置性资源的获取障碍与权威性资源的缺失共同导致老龄群体在数字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技术排斥作为初始触发点,直接激活老年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为后续环节的连锁反应奠定基础。

2. 信息环境维度:网络空间的信息茧房与风险扩散

在平台算法推荐机制裹挟之下,老龄群体长期被动接收同质化内容,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整体性、持续性的信息接收封闭状态。与此同时,网络信息良莠不齐,隐私泄露、网络欺诈等安全问题频发,进一步推动了网络空间风险扩散。这种不良的网络空间环境阻碍了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培育,由此催生的数字信任危机将进一步加剧信息层面的传播隔阂,让老龄群体在数字使用中陷入恐惧、回避、能力弱化的恶性循环。这一困境的形成与算法的隐性操控、风险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

平台算法并非中立的计算工具,其主要优化目标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与互动数据,背后内嵌着平台的资本利益诉求。算法通过精准捕捉老龄群体的兴趣偏好,持续推送健康养生、家庭伦理、怀旧情感等易引发共鸣的内容,逐步构建起同质化的信息茧房,实现对老龄群体认知的隐性规训^[23]。这种算法议程设置一定程度上窄化了老龄群体的信息视野,也固化了其认知框架,使其背离真实的数字社会生态,难以形成多元的信息认知与有效的信息甄别能力,加剧了老龄群体的信息茧房效应。与此同时,社会层面的风险话语建构进一步放大了信息环

境的负面影响。结合框架理论来看,为吸引流量、强化警示效果,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报道网络安全事件时形成了老龄群体等于数字弱者的固定报道框架,如部分媒体过度放大老龄群体遭遇网络诈骗的戏剧性后果,刻意突出其无力反抗的受害者形象^[24],这种具有放大效应的风险叙事既强化了社会对老龄群体数字能力的负面认知,也被老龄群体自身内化,催生了强烈的数字焦虑与不信任感。

此外,平台经济催生的数字劳动遮蔽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环境失衡。在玩乐即劳动、产消合一的数字经济模式下,老龄群体的日常数字活动被无缝接入平台的资本增值循环^[25]。打卡、做任务、转发点赞、贡献行为数据乃至自主创作内容这些看似日常消遣的线上行为,本质是能为平台创造流量、广告收益、数据资产等商业价值的数字劳动,但其劳动属性被完全掩盖。由于老年人自身未意识到劳动创值,社会也惯于将此类行为界定为打发时间的消遣,平台借此无偿占用老龄群体的劳动价值,形成隐性剥削。这种剥削之所以顺畅运行,正源于双重认知偏差的叠加:一方面,老龄群体对平台经济运行逻辑缺乏了解;另一方面,社会将数字行为简化为消遣或赚小钱,使老年人的深度参与异化为无意识的自我剥削。2025年四川省消委会发布的信息显示,部分老年人因刷短视频走路赚钱、免费领红包等话术诱导扣费^①,折射出平台利用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相对薄弱的特点,将数字劳动无偿转化为商业价值的现实困境。长此以往,老龄群体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认可,数字参与积极性也会持续受挫,最终愈发难以突破浅层使用、实现深度数字融入。

3. 社会支持维度:制度保障、数字反哺与公共服务的三重短板

当前,老龄群体数字融入的社会支持体系存在三重短板:制度保障仍有缝隙、家庭代际数字反哺缺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正是其数字素养培育缺乏外部支撑的核心症结。上述短板不仅持续固化数字接入障碍,更不断深化深度

^① 数据来源: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度消费者投诉信息统计分析报告》。

参与困境,成为破除传播障碍、消解传播隔阂的主要阻碍。

从制度保障层面来看,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常聚焦于行政效率提升与资源优化配置,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便民的初衷往往被简化成为数字技能熟练的群体提供便利。即便政策文本中包含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原则性条款,也因缺乏刚性实施细则、配套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而流于形式^[23],产生了制度缝隙。这种制度缝隙使得老龄群体的数字接入权仅停留在纸面上,无法转化为可触可及的实际服务,加之公共服务领域线上优先的转型模式大幅压缩线下服务渠道,反而给老龄群体数字融入增添了障碍。

从家庭支持来看,传统亲缘纽带构筑的线下支持体系在数字化浪潮中效能持续衰减,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断裂问题尤为突出。子女作为老龄群体接触数字技术的首要支持力量,因工作繁忙、异地居住、代际隔阂等诸种现实因素制约,其数字支持行为呈现碎片化、应急性的特征,无法为老龄群体提供系统、耐心且持续的数字技能指导^[14],难以发挥人际传播中家庭成员这一初级群体在知识传递、情感支撑中的重要作用。

从公共服务体系来看,网络空间话语权缺失与社会数字培训服务供给不足,对老龄群体的数字融入形成双重制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话语体系日趋视觉化、情绪化、碎片化与娱乐化,老龄群体所熟悉和擅长的兼具逻辑与经验的长文本表达模式难以获得主流关注与群体共鸣^[26];加之平台流量分配机制天然倾向于迎合年轻用户,养老保障、代际关系等与老龄群体切身相关的议题难以进入数字舆论场的中心地带^[27-28]。长此以往,老龄群体的数字表达与数字参与失去有效空间,传播隔阂持续加深,在网络空间中话语权日渐缺失。另一方面,社区、老年大学等公共服务载体的数字培训体系尚未健全,普遍存在资源短缺、内容脱离老龄群体实际需求、缺乏长期跟进指导等痛点,既无法有效弥补家庭数字反哺的不足,也难以覆盖算法认知识别、网络风险防范等高阶数字素养的培育需求。这种表达空间被压缩、学习服务缺位的公共支持断层将让老龄群体在数字融入进程中陷

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社会结构是通过个人行动而不断得以构成或再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使个人行动得以可能的中介^[20]。社会支持体系的断裂意味着老年人无法借助社会结构这一中介来获得数字实践所需的规则知识和资源支持,当社会支持体系缺位时,老年人无法从社会互动中获得积极的“镜中我”反馈,难以通过社会认可来重建数字自信。社会支持断裂切断外部赋能渠道,使老年人失去突破困境的关键助力,困境进一步加深。

4. 个体心理维度:个体认知的调适困难与心理防御机制的激活

相较于技术供给、信息环境、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个体心理层面的障碍是老龄群体数字融入的核心内在动因。受自身认知特点与数字使用畏难情绪影响,老龄群体极易滋生抵触心态、激活心理防御机制,进而主动回避数字使用,既削弱了数字参与积极性,也成为传播隔阂长期存续、数字素养难以自主提升的深层心理阻碍。

从认知调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操作逻辑与交互模式对老龄群体而言难度偏高,技术快速迭代的外部冲击加剧了数字融入的心理阻碍。对部分老年人而言,学习数字技术不只是技能习得,更是对原有生活方式的挑战,这种深层角色冲突会催生心理抵触与认同焦虑,进而外化为对数字工具的冷漠排斥。与此同时,数字技术高频更新、网络信息碎片化的特征,与老年人长期养成的传统信息接收习惯、慢节奏思维模式严重脱节,面对频繁更迭的操作规则和新潮网络话语,本就面临技术门槛的老龄群体,更容易产生学不会、跟不上的挫败感,即便勉强上手也仅能完成基础操作,无暇培养高阶信息甄别与自主使用能力,最终主动回避数字使用。

从主体性消解层面来看,技术依赖的深化削弱了个体的自主性,使其趋于被动。当数字应用深度嵌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场景,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时,老龄群体便逐渐形成了对技术的深层依赖^[29],其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也从最初的学习使用工具逐渐滑向被工具设定的流程所驯服,当移动支付、线上预约成为

唯一选择时,个体选择的自由与对生活的掌控感悄然流失,突破浅层使用、实现创造性数字参与的难度不断加大。叠加社会对老年数字弱者的刻板印象,老龄群体会自发激活心理防御机制,将数字世界视为危险、陌生的领域,采取主动疏离的自我隔离策略,彻底阻断了数字素养提升的内在动力,使其始终游离于数字社会边缘。

从自我认同层面来看,当老年人遭遇数字挫折时,其自我认同的连续一致性受到挑战,产生我不是数字时代的人的自我定位^[30]。自我认同的经验反思性使个体能够评估自身的认识能力,但若经验反思无法实现,个体在面对冲击事件时便会造成自我认同混乱,陷入认同危机。老年人在数字实践的行动流中频繁遭遇挫折,其会对自身行为进行持续观察、评估和调节的反思性监控过程持续产生消极反馈,导致行动合理化解释趋向负面,最终形成“自身不具备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主观判断,能动性由此受到抑制^[31]。

技术排斥、心理防御、社会支持断裂三者共同导致老龄群体数字资本贬值,在数字场域中被边缘化,而边缘化地位又通过反馈回路反作用于技术设计,形成新的排斥结构,完成自我强化的闭环。社会结构对于个人而言不仅具有客观制约性,而且由于其是人的无限次社会活动的结果,社会结构也就成了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一种记忆痕迹^[21]。老年人的数字边缘化地位作为一种记忆痕迹被固化下来,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被不断复制和强化,最终完成结构再固化的闭环。

五、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对策

智媒时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难难以依靠单一主体或局部调整来解决,需要超越“问题-应对”的线性思路,转向系统性治理。这意味着要将政府、平台、社会、家庭与个人等视为相互关联的行动主体,打破彼此之间的协作障碍,整合各方资源与优势,共同构建支持数字包容的良性生态。治理的核心在于打破困境的循环闭环:以技术向善为基础,净化信息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强化心理支持,形成多方协

同、权责明确、可落地的治理体系。在推进数字便利普及的同时,也要保障老龄群体的权益,让其不仅能跨越技术门槛,更能有尊严且主动地参与数字社会生活,真正实现“数字包容、老有所享、老有所为”。

1. 技术供给优化:摒弃功利化改造,构建全流程适老化原生设计体系

针对智媒技术结构性排斥、适老化改造浮于表面的核心痛点,需扭转“以年轻用户为核心”的设计偏向,将老龄群体的生理机能、认知特点与使用需求纳入技术研发全流程,实现从“后期适配”转向“源头设计”的转型,从根本上打破数字使用壁垒,让技术能够服务于全龄群体。

其一,完善适老化标准体系,推动技术设计贴合老年需求。由政府牵头制定数字产品适老化国家标准,覆盖界面设计、语音交互、操作流程、隐私保护等关键维度,明确考核细则^[32]。要求企业将适老化理念融入产品研发初期,而非简单叠加“长辈模式”。聚焦政务办理、医疗健康、生活缴费等高频场景,开发极简功能模块,增设一键呼叫、语音操控、亲情代办等实用功能;简化多级嵌套操作逻辑,优化视觉界面,兼顾视听觉衰退群体的需求。同时建立老年版应用“慢更新”机制,减少频繁改版带来的学习压力,微信、支付宝优化后的长辈模式精简步骤、强化核心功能,是可复制的实践范例^[33]。

其二,压实平台责任,监管与激励并行。将适老化达标情况纳入平台考核体系,推动技术回归普惠向善,避免适老化沦为公关表演。近年来有声音指出,平台端应设置便捷的“长辈模式”切换入口,引导平台引入“老年用户体验官”参与产品设计流程,确保功能开发契合老年人认知特点与操作习惯;政策端可通过税收优惠、认证倾斜等激励工具,引导平台开展深度适老化研发,同时建立第三方评测机制与“红黑榜”公示制度,对敷衍改造、“假适老”产品实施整改或下架处理。由此,以制度约束与市场激励形成合力,推动数字平台切实履行适老社会责任。

2. 信息环境净化:破除信息茧房与风险焦虑,创建安全包容的数字公共空间

信息茧房固化、风险话语放大、代际区隔加

深及数字劳动遮蔽等问题共同构成了老龄群体数字融入的现实障碍。对此,需从算法治理、风险防控与话语空间拓展三方面协同推进,重塑数字信息生态,缓解老龄群体的信任危机与使用焦虑,为其信息获取、公共表达与价值认同创造更有利的传播环境。

一方面,推进算法向善治理,筑牢老年数字安全防线。建立老龄群体算法专项评估与定期审计机制,优化推荐算法逻辑,限制过度精准推送,增设信息多样性调节开关,破除信息茧房对认知视野的窄化效应。监管部门持续整治针对老年人的网络诈骗、虚假信息与恶意营销,平台方推出老年防护模式,强化支付验证、风险拦截与隐私保护。研发智能识别与过滤模型,对高风险内容进行醒目标注,对疑似陷入诈骗的老年用户开展主动友善提示与干预。媒体与社区开展适老化反诈宣传,采用图文、短视频、情景剧等老年人易接受的形式进行风险提示,提升其信息辨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完善数字权益救济机制,为遭遇数字侵害的老年人提供投诉、维权与法律援助,重建老龄群体对数字媒介的信任感,从根源上缓解恐惧型数字排斥。

另一方面,规范信息叙事话语,扩大老龄群体话语权。引导平台摒弃“老龄群体是数字弱者”的刻板叙事,加大涉老正向内容供给,优化流量分配机制,为养老保障、老年生活等议题提供一定的流量支持,让老龄群体的理性表达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现实案例表明,这一转变正在发生。抖音 2025 年推出“银龄计划”,重点扶持中老年达人,通过流量倾斜扩大传播声量;快手将 45 岁及以上“新银发人群”定位为消费市场重要引擎。在平台支持下,一批“银发网红”成功破圈,老龄群体正从“数字围观者”转变为“内容生产者”,在数字空间掀起“跨代同频”的情感共振,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此外,规制平台隐性价值抽取行为,杜绝无偿占用老龄群体数字劳动成果。平台任务与积分模式需纳入有效监管框架,明确老龄群体数字劳动的价值认定标准与回报机制,强化个人信息采集的边界约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公安部“护网—2025”专项工作公布多起不履行

数据安全义务的典型案例。这些监管行动为规范平台行为、保障老年用户数字权益营造了更为清朗的网络信息环境^[34-35],未来应进一步细化平台任务与积分模式的合规标准,建立老年用户价值回报评估机制,将信息安全保护纳入平台适老化考核,切实提升老龄群体数字参与的获得感。

3. 社会支持补位:完善多层支撑体系,筑牢数字融入的兜底保障

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离不开多层次社会支持体系的协同配合,制度保障、家庭反哺与公共服务需形成合力,让社会支持的力量从分散走向整合,从文本走向实践,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老龄群体数字融入提供有效的外部支持。

其一,健全制度兜底机制,弥补制度缝隙。将老龄群体数字包容纳入公共服务数字化顶层设计,细化权益保障实施细则,配套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刚性落实“线上优化、线下托底”原则,严禁民生场景盲目取消线下人工通道,重大数字化项目须开展老龄包容性评估,确保老龄群体的数字接入权落地。2026 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此提出立法建议,如增设“数字权益”专章入法,明确老年人在公共及商业服务中享有线下人工服务选择权,禁止算法歧视与“数字排斥”;同时将数字适老纳入规范框架,避免数字技术成为“少数人的福利”。未来应加快推动相关立法进程,强化制度执行监督,确保老龄群体数字权益真正落地见效、惠及于人。

其二,激活家庭代际数字反哺,修复亲情支持纽带。通过公益宣传倡导强化子女反哺责任,鼓励晚辈开展耐心、持续的技能指导,将数字教学转化为代际情感互动,化解异地居住、代际隔阂带来的反哺碎片化、应急化问题,发挥家庭初级群体的知识传递与情感支撑作用^[36]。社交平台可借鉴“#我教爸妈用手机”等话题活动经验,以线上互动带动家庭内部的理解与支持;社区层面可推广“银龄数字生活学院”等公益项目模式,依托社区服务点开设定期培训课程,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咨询与答疑服务,让代际帮扶从家庭延伸至社区,形成亲情支持与社会

协助相结合的反哺网络。

其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补齐素养培育短板。将老龄群体数字教育纳入公民终身教育体系与社区公共服务清单^[37],搭建常态化培训平台,开发贴合老年生活需求的场景化、模块化课程。可借鉴芜湖老年大学《赭山大讲堂》融媒体矩阵经验,采用电视录播、APP点播与公众号指南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学习资源互通。同时培育专业社会组织与热心老年朋辈带头人,推行“数字鸿沟扫盲行动”等接地气的“老帮老”互助学习模式,通过线下实操、线上回看与银发志愿者帮扶,让数字赋能举措真正落地老龄群体身边,直达服务“最后一公里”^[38]。

4. 个体心理赋能:消解防御抵触心态,激发数字融入的主体能动性

老龄群体数字融入的内在障碍需要通过持续的心理疏导、认知引导与氛围营造来化解,关键在于让老年人从被动依附的状态中走出来,逐步建立对数字技术的信任与掌控,形成主动参与的意识与能力。

其一,提供心理疏导,缓解数字焦虑。依托社区、养老机构开设心理辅导服务,帮助老年人化解“学不会、跟不上”的挫败感,减轻对数字风险的担忧。引导老年人正视技术门槛,消除焦虑与排斥心理,改变“数字世界危险陌生”的片面认知。如四川省隆昌市古湖街道社区组织网格员为独居老年人提供“代办+教学”服务,在协助医保缴纳的同时讲解操作流程,以陪伴式指导缓解老年人的数字畏难情绪。要将心理关怀嵌入技能培训,通过团体辅导、同伴互助等形式,帮助老年人在支持性环境中逐步建立使用信心。

其二,重塑数字自我认同,激发主体参与意识。通过榜样宣传塑造“乐学善用”的老年数字形象,帮助老年人树立“按需学习、乐享生活”的心态,正视认知节奏差异,不盲目追求操作熟练度。从基础操作起步,培养信息甄别与自主使用能力;鼓励尝试数字创作,体验成就感,从被动依附转向主动掌控,重拾参与信心。当老年人从数字内容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其自我效能感与价值认同随之提升。挖掘本土

“银发达人”,通过经验分享、技能展示等载体,形成可感知的榜样参照。

其三,提升安全意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帮助老龄群体培养信息甄别能力,对陌生链接、高额返利、索要验证码等常见风险保持警惕,学会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让老年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融入数字生活,打破因担忧风险而回避使用的恶性循环。曲阜师范大学实践队在潍坊诸城社区采用“案例分析+互动答疑”方式讲解常见诈骗手段;重庆市老龄办联合多部门发布2025年度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聚焦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新型诈骗等热点问题。将反诈教育纳入社区数字培训模块,邀请公安民警、银行工作人员开展情景模拟,帮助老年人在真实场景中掌握风险识别与应对技能。

六、结 语

智媒时代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彰显数字社会温度的重要体现。立足媒介素养理论,本研究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媒介素养在数字时代的衍生形态,构建涵盖基础操作、认知批判、实践赋能的三维分析体系,并将算法素养、人工智能素养纳入其中,弥补了传统媒介素养在智媒时代的适配缺口。在此基础上,引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基于结构二重性命题贯通微观个体实践与宏观社会结构,揭示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是技术供给结构性排斥、网络信息环境失衡、社会支持体系缺位与个体心理防御机制激活等多层因素叠加所致。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技术排斥、心理防御、社会支持断裂与结构再固化4个环节的内在关联,揭示了四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自我强化闭环机制,为理解老龄群体数字边缘化的持续再生产提供了动态解释框架。破解这一困境,需要超越将责任归于老年人“学不会”的简单归因,转而构建政府、平台、社会、家庭与个体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技术设计应回归普惠初衷,信息环境需兼顾安全与包容,社会支持要从纸面走向实践,个体心理赋能则需贯穿数字融入全过程。

数字包容的本质不是让老年人追赶技术,而是让技术适配不同群体的生活节奏与认知特

点。未来研究可开展纵向追踪与实证检验,拓展跨文化、跨地域比较,构建长效评估机制,持续关注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共同推动包容性数字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COULDRY N,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131-132.

[2] 陆杰华, 韦晓丹. 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J]. 人口研究, 2021, 45(3): 17-30.

[3] 武文颖, 潘瑜琦, 高艺宸. 反思以促转化: 老年人数字技术采纳的动态转化机制[J]. 新闻与写作, 2026(2): 69-81.

[4] 罗强强, 郑莉娟, 郭文山, 等.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5): 130-139.

[5] 董焕晴, 曹高辉, 王靖坤.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融入: 老年人数字生活融入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J/OL]. 情报科学, <https://link.cnki.net/urlid/22.1264.G2.20251222.1731.018>.

[6] 刘述.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香港老年人数字融入路径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 2021(3): 67-75.

[7] 胡泳, 朱政德. 从适老化到数字适老化: 趋势、问题与反思[J]. 新闻界, 2025(4): 53-68.

[8] RIDLEY M, PAWLICK-POTTS D. Algorithmic literacy and the role for librari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2021, 40(2): 1-15.

[9] 彭兰. 如何实现“与算法共存”——算法社会中的算法素养及其两大面向[J]. 探索与争鸣, 2021(3): 13-15.

[10] NG D T K, LEUNG J K L, CHU S K W, et al. Conceptualizing AI literacy: an exploratory review [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1(2): 100041.

[11] SANDER I. Critical datafication literacy: a framework for educating about datafication [J].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s, 2023, 48(4): 595-614.

[12] FUCHS C.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21: 97-123.

[13] BUCHER T. If... 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8-42.

[14] 李韵秋, 李斯. 子代教育水平、反哺途径与老年人数字接入鸿沟[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4): 62-71.

[15] 汪斌. 数字红利视角下老年数字失能表现、成因及治理新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60-67.

[16] 赵淼, 刘银喜. 公共价值共创何以弥合老年数字鸿沟? ——基于上海市“数字伙伴计划”的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 2026(3): 16-28.

[17] 黄英辉, 王伟军, 刘辉, 等. 个性化信息推荐中的过度特化问题研究进展[J]. 情报科学, 2022, 40(8): 185-192.

[18] 顾晨昱. 算法推荐内容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反哺的干预实验[J]. 国际新闻界, 2025, 47(2): 27-48.

[19] 邓胜利, 李雅静. 突发公共卫生情境下中老年人虚假健康信息应对行为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 42(2): 43-51.

[20] 谢立中. 主体性、实践意识、结构化: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再审视[J]. 学海, 2019(4): 40-48.

[21] 张云鹏. 试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4): 274-277.

[22] 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86-89.

[23] 王增文, 罗佩玲.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数智化转型: 逻辑转换、衍生风险与化解路径[J]. 行政论坛, 2025, 32(6): 16-25.

[24] 刘国强, 吴玉婷. 数字弱者与技术迷思: 老年群体 ICT 使用报道的隐喻运用与媒体建构[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8): 122-130.

[25] 孙绍勇, 王雨晨. 数字劳动中隐蔽性数字剥削的深层逻辑解蔽——以社交平台劳动为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5, 46(1): 59-68.

[26] 曾盛聪, 董沁昕.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J]. 人文杂志, 2022(6): 50-58.

[27] 宋月萍, 彭可余.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 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5): 118-128.

[28] 徐倩. 老龄数字鸿沟根源剖析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94-101.

[29] 王杏, 李其容, 孟猛, 等. 老年数字失能的概念构建与生成机制——基于就医情境的质性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25, 46(4): 36-44.

[30] 姚上海,罗高峰.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自我认同研究[J]. 理论月刊,2011(3):46-49.

[31] 张广利,王登峰. 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J]. 学术交流,2010(7):135-139.

[32] 欧阳材泓,谢立黎. 弥合与跨越:中国数字技术适老化政策的发展演进与量化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2025,33(6):106-116.

[33] 王馨笛,赵宇翔. 健康 App 适老化设计对老龄用户价值实现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23,44(2):31-41.

[34] 范进学,马冲冲. 论我国养老服务立法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1):100-116.

[35] 程乐,刘秀丽.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法治保障研究[J]. 思想理论战线,2024,3(1):71-79.

[36] 肖涵,黄静蕾. 社会支持网络对老年数字鸿沟弥合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社会,2024,40(4):67-82.

[37] 吴峰,范贤睿. 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涵、挑战与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22):17-21.

[38] 王艳玲,姜怡宁. 老年数字鸿沟之痛及弥合之径[J]. 新闻爱好者,2021(7):31-34.

The Generation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 JIANG Yan¹, Zhong Danian²(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 Television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the elderly group generally faces dilemmas of digital inclusion, including weak basic digital operation skill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bility, and a lack of in-depth participation. Based on media literacy theory, this study defines digital literacy as a derivative form of media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basic operation, cognitive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empowerment. By introducing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it reveals that the generative dilemma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the elderly results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tructural exclusion in technology supply, imbalance in the onlin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bsence of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activa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These four factors transmit sequentially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cyclically, forming a self-reinforcing closed loop. Accordingly, a systematic improvement mechanism with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society,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is proposed. At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supply, it advocates abandoning utilitarian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full-process age-friendly native design,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ate adaptation” to “source design”. At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t calls for advancing the good-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breaking information cocoons, regulating platforms’ implicit value extraction, and expand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elderly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At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it emphasize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ctivating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feedback within families, and optimizing public service supply. At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level, it focuses on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empowerment, reshaping the elderly’s digital self-identity, and stimulating their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liminat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help the elderly achieve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integr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building active aging and an inclusive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 intelligent media era; elderly group; digital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digital divide; generation dilemma